

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 基于中国大学生的检验^{*}

蔡华俭¹ 黄玄凤¹ 宋海荣²

(¹中山大学心理学系, 广州 510275) (²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系, 美国加州戴维斯, 95616)

摘 要 在西方文化下, 关于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致性模型、双性化模型、男性化模型。按照一致性模型, 具有男性化特质的男性和具有女性化特质的女性是最为理想的; 按照双性化模型, 在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两个维度上得分都高的个体社会适应性最强而且心理最健康; 按照男性化模型, 男性化特质才是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主要决定因素。研究运用大样本的网络数据, 探讨在中国文化下, 上述三个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 具体地, 在性别角色类型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的适用性。结果发现: 双性化模型得到支持, 同时具有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最高; 男性化模型和一致性模型都没有得到支持。这表明当代西方文化中的理想模型——男性化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 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型具有文化特异性。这一结果不仅增进和丰富了人们对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的认识, 还对我国目前青少年良好个性品质的塑造和培养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 性别角色, 双性化, 主观幸福感, 中国,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过去十多年来, 文化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 人类的心理过程和行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在心理和行为的许多方面存在巨大不同, 比如: 注意^[1], 分类^[2], 思维风格^[3], 归因^[4], 自尊^[5], 自我调节^[6], 对未来的预测^[7], 选择和动机^[8], 情感^[9]以及主观幸福感^[10, 11]等等 (详见相关综述文章^[12, 13])。性别角色是西方现代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 Bem 双性化量表的编制和双性化模型的提出催生了大量关于性别角色的研究^[14 ~16]。但是, 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关于性别角色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或个人主义文化下完成的, 不同文化视野下的研究很少见。鉴于文化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 本研究将着重探讨西方文化下三种性别角色模型在中国文化下的适用性, 即一致性模型 (congruency model), 双性化模型 (androgyny model) 以及男性化模型 (masculine model)^[17] 在中国文化下的可推广性。具体地我们将探讨三种理论模型在解释中国文

化下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适用性。

1.1 性别角色类型及西方的相关研究

和我们日常的理解不同, 在性别角色研究中, 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通常代表两类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适应价值的特质。前者多指传统上用来描述男性在能动性 (agentic) 方面好的品质, 比如独立、自信、有抱负等; 后者多指传统上用来描述女性在集体性 (communal) 方面好的品质, 比如善解人意、热情、乐于助人等。男性化特质通常有利于个人成就的实现, 具有工具性特征 (instrumentality), 而女性化特质通常有利于和谐关系的构建, 具有表达性特征 (expressiveness)^[16]。在西方, 根据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或适应性的关系, 对于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 主要有三种理论模型: 一致性模型 (congruency model), 双性化模型 (androgyny model), 男性化模型 (masculine model)。不同的模型对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致性模型又称性别角色的传统模型。该模型认为,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同一特质的两种极端表现, 二者共同构成同一维度的两极。不管是男性

收稿日期: 2007-09-19

*中山大学“985 工程”队伍建设“百人计划”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支持。

通讯作者: 蔡华俭, E-mail: huajian.cai@gmail.com

还是女性,理想的性别类型是和生理性别相一致的类型。也就是说,具有男性特质的男性和具有女性特质的女性通常具有最好的适应性和心理健康。双性化模型认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两极,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的维度。理想的性别角色是同时具有高的男性特质和高的女性特质,即具有双性化特征的人将具有最好的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进一步的,双性化模型又可以分成两种:加法模型(addictive model)和乘法模型(multiplicative model)。这两种细分模型主要是从统计角度来定义的。在考察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对个体的心理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的作用时,如果效应的总和等于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主效应的总和,而不存在交互作用,则该双性化模型是可加的;如果除了主效应外,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还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则该双性化模型属乘法模型^[17~19]。男性化模型是在双性化模型基础上提出来的,按照该模型,双性化模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男性化特质,不管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如何,男性化才是理想的性别角色,男性化特质才是决定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在当代西方,传统的一致性模型基本没有市场,双性化模型虽然最初是作为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型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和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系列元分析却表明男性化模型才是最理想的模型^[17,20~22]。那么,在西方文化下盛行的男性化模型是否也适合当下的中国呢?是否可以解释中国文化下的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呢?

1.2 文化、性别角色及主观幸福感

文化和性别角色关系密切,个体性别角色的获得和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社会或文化所认可的价值的内化而完成的^[23]。这一点不仅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16],西方关于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的理论演进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以前,西方社会在两性的角色分化上观点总体趋于保守,男性在社会及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在很多时候从属并服务于男性,社会对男女两性的角色要求和定位区分非常明显。与此文化相适应,主张男女有别的一致性模型便成为最为合适的理论,即男子应该具有男性化特质,女子应该具有女性化特质。60年代后,由于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广泛兴起,女性自我意识的空前提高,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广为接受的价值,大量女性走出家庭,在工作中寻求自我价值,适应这

一文化变化的要求,传统的一致性模型便逐渐被双性化模型取代,同时具有高的男性特质和高的女性特质的双性化类型成为最为社会认可、最为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60年代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独立性,个体越来越关注自我、追求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等。由于男性特质的诸多特征正好和这一系列新的社会价值相一致,男性化模型便因时而生。可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理想性别角色的内容并最终影响个体自我性别角色的形成。

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总体上讲,西方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东方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24]。个人主义的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能动性(agency)和果断自信(assertiveness)等,这些基本都属于男性特质的特质范围之内,因此,个人主义的文化是一种鼓励和促进男性特质的文化,具有男性特质通常是适应良好的标志。与此相对,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相依性(interdependence)、集体性(communality)、关系和谐通常得到特别的重视和强调,因此和女性特质相关的集体性特质通常得到社会推崇,对文化的良好适应通常意味着具有比较多的女性特质^[16,24]。可见,东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良好地适应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需要有不同的特质。就性别角色而言,男性特质更能促进对西方文化的适应,女性特质更能促进对东方文化的适应。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我适应社会良好与否的重要心理指标。高的主观幸福感通常意味着特定文化下良好的自我调适(adjustment),因此,文化和主观幸福感也有密切关系。由于东西方文化强调不同的价值取向,幸福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下通常也有着不同的含义。研究表明,与个人相联的价值、目标、成就、情感等在西方文化下比在东方文化下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更好的预测效度;而个体与他人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与质量,对集体目标的追求和实现等在东方文化下比西方文化下能更好地预测主观幸福感^[26~32]。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似乎不难预期,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女性特质将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更高的预测能力。目前,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情景。首先,和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西方相比,中国无疑仍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国家^[24],对和谐关系的强调、对集体的注重等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一切无疑都会促进个体女性化特质的发展。其次,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依然影响深远。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处于从属和服务地位。按照这一传统,西方传统的关于性别角色的一致性模型无疑将是最适合中国人的理想模型,因为这一模型与男女有别的传统价值有着最好的对应。还有,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集体的服从的辩证平衡,更特别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些文化元素无疑意味着双性化的性别角色类型将为理想的类型。最后,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下,个体对自我的关注、对个性的追求、对个人幸福的追求等观念不仅在当代青年中非常盛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也非常明显,尤其是80后的一代,个人主义倾向更是明显^[33]。这些西方文化元素的影响无疑将会增加男性化特质的作用。总之,在目前中国文化如此多元复杂的图景下,任何简单的预期可能都是不合适的,开展实证研究应该是寻求答案的最佳方式。

1.3 性别角色研究在中国

中国心理学界对性别角色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已有近百篇研究或相关论述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对西方性别角色有关概念和理论的介绍^[34, 35];2)对性别角色量表的修订和性别角色结构的探索^[36~39];3)中国人的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状况^[37, 38, 40]及其与心理健康^[41, 42]、社会适应^[43]、主观幸福感^[44]、人格^[45~47]、人际交往^[48]、情绪^[49, 50]等的关系;4)性别角色的发展与教育^[51, 52]。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大学生为样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性别角色和心理健康或适应性的关系。这些研究虽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但是,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在理论上,大多数的研究都显得薄弱: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掌握不够充分,尤其是忽略了文化对性别角色及相关变量的影响,没能够把研究结果放在国际的大背景下,从而在全领域的基础上来探讨研究的意义。

其次,在方法上,国内迄今的研究普遍是参照性别角色研究早期的一些做法,把样本在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两个维度上的分数分布的中位数作为切分点(cutoff score),把人群分成四个类别:双性化、男性化、女性化和未分化。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直观,便于一般人理解和接受,并能粗略揭示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及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但是缺点

也非常明显:以中位数为切分点,人为地把连续变量进行二分的方法,使在同一类别的个体间的个别差异信息都丧失殆尽,如果再以此为基础对不同类别的个体在其他变量上差异进行检验(比如,心理健康),将会使统计的检验力(power)大大降低,使得主效应和交互作用的显著性难以检验出来;有时还会使由虚假效应(spurious effect)导致的显著但实际上并不显著的关系的概率大大增加;更无法检查变量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等等^[53~56]。更重要的是,在性别角色研究中,这种方法无法考察性别角色的两个维度对因变量的贡献具体大小,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因而不仅无法准确考察男性化模型的适用性,而且还无法考察一致性模型是否合适,更不用说考察在加法效应之外,是否还存在乘法效应,即到底是加法模型还是乘法模型适应更为适合。

总之,国内虽然已经有不少研究涉及性别角色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并且多数研究发现双性化的人有最好的心理健康和适应水平,但是,这些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粗略的,方法上的不足不仅使结果的可靠性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1)迄今没有研究检验传统的一致性模型是否适合中国;2)没有研究检验到底是双性化的加法模型还是乘法模型更适合中国;3)没有研究检验男性化模型是否适合中国;4)对结果意义的解释和定位上缺乏全局性,没能在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视野下审视研究的价值。目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内已有研究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展开的。

1.4 研究扼要

鉴于文化对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型的影响和国内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在文化心理的视野下,探讨西方已有的性别角色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将以心理适应和健康的重要指标主观幸福感为例,具体地探讨西方的理论模型在解释中国文化下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的适用性。我们将不仅考虑主观幸福感的认知侧面:生活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Life; SWL),还考虑主观幸福感的情感侧面:个人的积极和消极情感体验(Positive Affection and Negative Affection; PANA)。

为克服国内目前类似研究在方法上的缺陷,在统计上,我们参照Lubinski等的研究^[18],以原始连续数据为基础,采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来逐步检验我们的假设。假如用 Y 表示主观幸福感, M 表示男性化特质, F 表示女性化特质, S 表示性别, B 为

回归系数, 对于主观幸福感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对如下的回归方程的检验来实现:

$$Y = B_0 + B_1 M + B_2 F + B_3 S + B_4 (M \times F) + B_5 (M \times S) + B_6 (F \times S)$$

其中, 三个主效应项先进入方程。如果传统的一致性模型不成立, 则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与性别的交互作用 $M \times S$ 和 $F \times S$ 都不会显著, 反过来, 如果两个交互作用都显著或其中一个显著, 并且交互作用的方向和理论预期一致, 则传统的一致性模型得到支持或部分支持; 基于同样的逻辑, 如果男性化特质 M 和女性化特质 F 的主效应显著, 但二者的交互作用 $M \times F$ 不显著, 则双性化加法模型得到支持; 如果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的主效应显著, 并且二者的交互作用 $M \times F$ 也显著, 则双性化的乘法模型得到支持; 如果只有男性特质的主效应显著或者男性特质的主效应显著超过女性特质的主效应, 则男性化模型得到支持。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 我们将采用网络数据。和传统的纸笔测验或在实验室通过计算机收集的数据相比, 利用网络可以收集到非常大的并且更加多样化的样本, 这样将可以使研究的结果更为可靠和更具推广性。国外大量研究表明, 网络数据是可靠的^[57]。国内的最新研究也表明网络测验在中国文化下也是可靠的^[58]。已有很多利用网络收集数据的研究在国外发表^[59-61], 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 而且获得了许多纸笔测验难以得到的结果。因此, 利用网络收集数据开展研究是可行的。

此外, 本研究只关注目前在校的大学生。这样做是出于: 1) 迄今为止国内外绝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以大学生样本为基础的, 在目前的研究中采用大学生作样本将可以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可比性; 2) 中国目前的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大学生既受到了最长期的正规教育又相对充分地被社会化, 思想开放, 具有最强的接受能力, 应该最能成为当下多元文化的载体。

总之,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利用大样本的网络数据, 全面深入地考察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探讨西方文化下获得的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

2 方法

2.1 量表

2.1.1 贝姆性别角色量表 (Bem Sex - role Inventory; BSRI) 本研究采用由卢勤和苏彦捷修订的

BSRI 的中文版^[37]。中文版中, 男性特质量表有 14 个项目, 女性特质量表有 12 个项目, 中性干扰量表有 20 个项目。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36]。本研究中, 要求被试在一个 7 点量表上对每一特质词适合描述自己的程度进行评价, 1 = 非常不适合, 7 = 非常适合。由于本研究中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量表的项目数量不一致, 研究中最后以被试在两个量表上的项目平均分作为两个分量表的得分。

2.1.2 主观幸福感测量 (Subjective Well - Being Scale; SWBS) 本研究采用两个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量表 (Positive affection and Negative affection Scale; PANAS), 前者主要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认知侧面, 后者主要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情感侧面。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 5 个项目, 迄今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150 多个国家应用过, 被广泛地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62,63]。问卷要求被试在一个 7 点量表上表明自己对各陈述的同意程度, “1”表示非常不同意, “7”表示非常同意。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量表包括 8 个项目^[30], 其中, 4 个项目测量积极情感体验, 4 个测量消极情感体验, 问卷要求被试在一个 7 点量表上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在生活中体验各测量的情感, “1”表示非常少, “7”表示非常多, 计时时先将消极情感反向, 然后再和积极情感项目一起记入量表分。为了和性别角色量表的计分保持一致,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两个分量表, 我们都采用项目的平均分作为量表分。

2.2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2.2.1 数据采集 网络数据通过一个专业数据收集网站完成。为了吸引被试, 在开始的指导语中明确告诉被试, 测验后将可以马上得到一个简单的免费反馈, 如果留下邮件地址, 整个研究完后将可以得到个人的测验结果和一个简单的解释。测试完后, 马上给被试关于该测验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简单介绍, 并谢谢被试的参与。测验为匿名, 个人信息要求提供性别、年龄、所在地区、是否在校大学生等, 此外, 测验的参与者的 IP 地址和参与时间也被自动记录。测验网页面向全体网民。本研究中采用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至 8 月 25 日之间收集的数据, 记录在库的数据共有 3605 份, 其中在校大学生参与者为 1262 人, 被试范围包括全国所有省区。

2.2.2 数据预处理 由于本研究只关注大学生群体, 因此, 数据的预处理将以 1262 名在校大学生为

基础。首先,我们依次对被试的年龄、男性化特质、女性化特质、生活满意度、积极和消极情感进行单变量的检验,对年龄不在合理范围和量表得分在3个标准差之外的被试视为极端值,予以剔除。这样先后被剔除的被试包括:8名年龄不在17~25岁之内的被试;4名在男性化特质量表上得分超出均数三个标准差的被试;3名在女性特质量表上得分超出均数三个标准差的被试。其次,我们对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进行双变量的检验(通过考察散点图等),理论上讲在生活满意度上得分高的被试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上得分也高。这样,1名极端值被剔除(在生活满意度量表上得分超过6分,但是在情感量表上得分低于2.5分)。最后,进行多元极端值的检验。检验通过两个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分别以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为因变量,以男性特质、女性特质以及性别为预测变量。这样,共发现4名马式距离(Mahalanobis distances)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大于12),于是被剔除。这样,最后剩下1242名被试在各项指标上均在正常范围内,分布均呈常态,进入最后的分析。

在最后的由1242名在校大学生构成的样本中,男性为394人,女性为848人;年龄最大的为25岁,最小的为17岁,均数为20.88,标准差为1.46。本研究中,各量表的信度都很高:男性化特质量表的信度为0.86,女性化特质量表的信度为0.82,生活满意度量表的信度为0.85,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的信度为0.85。

3 结果

由于本研究样本很大,很小的效应都可能导致显著的结果^[64]。在以下的分析中,对于那些效应很小但依然显著的结果,我们视之为大样本导致的结果,将不进行太多的解释和讨论^{*}。

3.1 对各量表分的初步分析

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的各分量表的得分情况见表1。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间的相依和关系的和谐,鼓励女性特质的发展。因此,我们预期,在中国,中国大学生在女性化特质上得分高于男性特质;同时还由于中国传统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我们预期男生在男

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量表上得分均高于女生。为此,我们以被试在性别角色量表上的得分为因变量,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为重复测量的被试内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进行二因素的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结果证实了我们的预期,性别角色效应显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大学生在女性特质上得分显著高于男性特质, $F_{(1,1240)}=418.22, p<0.001, \eta^2_{\text{p}}=0.25$;性别差异显著,男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F_{(1,1240)}=17.05, p<0.001, \eta^2_{\text{p}}=0.014$;交互作用不显著, $F_{(1,1240)}=0.06, p>.05, \eta^2_{\text{p}}=0.000$ 。

对于主观幸福感,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情”的重视甚于“理”^[65],并且跨文化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人在情感侧面的自我评价高于认知侧面^[66,67],这里我们预期,中国人在主观幸福感的情感量表上得分高于认知侧面。同样,我们以主观幸福感的两个分量表为自变量,性别为被试间变量,进行二因素的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和预期一致,大学生在情感幸福量表上得分显著高于认知侧面的量表, $F_{(1,1240)}=326.61, p<0.001, \eta^2_{\text{p}}=0.21$ 。但是,性别差异不显著, $F_{(1,1240)}=3.51, p=0.06, \eta^2_{\text{p}}=0.003$;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_{(1,1240)}=3.079, p=0.08, \eta^2_{\text{p}}=0.002$ 。

表 1 各量表得分基本情况

性别		M	F	SWL	PANA
男	Mean	4.85	5.37	3.84	4.45
	SD	0.79	0.72	1.20	0.94
女	Mean	4.69	5.20	4.00	4.51
	SD	0.83	0.71	1.22	0.96
性别差异					
	<i>t</i>	3.17	3.90	-2.23	-0.95
	<i>p</i>	<0.01	<0.01	<0.05	0.34
	Cohen's <i>d</i>	0.20	0.24	0.13	0.06

注: M 为男性特质量表, F 为女性特质量表, SWL 为生活满意度量表, PANA 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量表。

为了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我们又对样本中各种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的分情况布进行考察。按照常用的分类方法,以男性化特质量表和女性化特质量表的中位数为切分点,在两个维度上对全部被试分成高低两个群体,然后两两组合共形成

^{*} 按照 Cohen 的标准^[63], $d=0.2$ 左右为小的效应, $d=0.5$ 左右为中等程度的效应, 0.8 左右为大的效应; 方差分析中, η^2_{p} 小的效应为 0.01 左右, 中的效应为 0.06 左右; 大的效应为 0.14 左右。一般而言, 效应值和样本的增大, 都可能导致显著性水平的提高, 如果样本很大, 即使很小的效应也可能导致显著的结果。

四个类别: 双性化群体、男性化群体、女性化群体、未分化群体。各类型群体的分布状况见表 2。卢勤等采用同样量表在此前的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也列在了表 2 中^[37]。和卢勤等的研究结果相比, χ^2 检验显示, 总体上, 本研究中各种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状况

和他们的研究没有显著性差异; 具体到女性样本上, 两个研究也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是在男性样本上, 二者差异显著。对此, 我们将在讨论中予以更多的说明。

表 2 四种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情况

性别角色 类型	总体 ($\chi^2=1.55, p=0.67$)		男 ($\chi^2=14.10, p<0.01$)		女 ($\chi^2=1.91, p=0.59$)	
	本研究	前人研究	本研究	前人研究	本研究	前人研究
男性化	17.5	22.3	14.5	27.7	18.9	16.1
女性化	17.4	17.2	18.8	13	16.7	21.9
双性化	33.0	29.2	40.4	28.8	29.6	29.7
未分化	32.1	31.3	26.4	30.5	34.8	32.3

3.2 性别角色与主观幸福感

在运用回归分析对各种不同模型进行全面检验之前, 为了给出一个直观结果, 也为了便于和国内相关研究对比, 我们在这里先进行一些基于上述分类的分析。四种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见表 3。从表中可以粗略地看出, 双性化的个体在两个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均最高, 其次是男性

化和女性化的个体, 得分最低的是未分化的个体。为揭示不同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 以性别和性别角色类型为自变量, 以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幸福为因变量, 我们首先进行了一个多变量的方差分析, 然后再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单变量的方差分析和系列事后检验。

表 3 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性别角色 类型	SWL						PANA					
	男		女		总体		男		女		总体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双性化	4.25	1.29	4.43	1.20	4.36	1.23	4.77	0.93	4.78	0.96	4.78	0.95
女性化	3.75	1.01	4.09	1.23	3.86	1.03	4.58	0.80	4.47	0.82	4.50	0.83
男性化	3.69	1.14	3.90	1.04	3.95	1.21	4.21	0.85	4.61	0.99	4.47	0.96
未分化	3.36	0.97	3.64	1.20	3.57	1.15	4.08	0.89	4.25	0.95	4.20	0.94

多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性别角色类型差异显著, $F_{(6, 2468)}=17.97, p<0.01, \eta_p^2=0.042$, 性别差异也显著, $F_{(2, 1233)}=5.69, p<0.01, \eta_p^2=0.009$ 。这表明, 总体上讲, 不同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同。

我们再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幸福分开进行单变量的方差分析。对于生活满意度, 结果显示, 性别差异显著, $F_{(1, 1234)}=17.36, p<0.01, \eta_p^2=0.009$, 女生生活满意度更高; 性别角色类型显著, $F_{(3, 1234)}=30.31, p<0.01, \eta_p^2=0.069$; 交互作用不显著, $F_{(3, 1234)}=.48, p=0.70, \eta_p^2=0.001$ 。对于情感幸福, 结果显示, 性别差异显著, $F_{(1, 1234)}=3.91, p<0.05, \eta_p^2=0.003$, 女生体验更多的情感幸福; 性别

角色类型显著, $F_{(3, 1234)}=25.83, p<0.01, \eta_p^2=0.059$; 交互作用显著, $F_{(3, 1234)}=2.883, p<0.05, \eta_p^2=0.007$ 。总之, 在认知和情感两个侧面上, 不同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的幸福感受都是不同的。

为进一步揭示不同性别角色类型间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细节, 我们分别以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幸福为指标, 进行了系列事后检验, 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 不管采用哪种指标, 双性化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都显著地高于其他类型, 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个体间的差异不显著, 但是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都要高于未分化的个体。总起来, 双性化个体幸福感最高, 男性化和女性化个体其次, 未分化的个体最低。

表 4 不同性别角色类型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成对比较

性别角色类型	SWL			PANA		
	双性化	男性化	女性化	双性化	男性化	女性化
男性化	0.50 **			0.27 **		
女性化	0.41 **	0.08		0.30 **	0.03	
未分化	0.79 **	0.29 **	0.38 **	0.57 **	0.29 **	0.29 **

注: 所有数字为差异分的绝对值, ** $p<0.001$

上面的分析初步显示了不同性别角色类型的个体在主观幸福感上得分差异状况, 与国内其他相关结果基本一致, 双性化模型得到支持, 但是, 我们不知道其他的模型是否适合。下面, 我们运用分层回归作更为详细地分析, 以检验各种可能模型的适用性。根据 West 等人的建议^[68], 我们首先对性别进行不加权的效应编码 (unweighted effect coding) (‘-1’表示男性, ‘1’表示女性), 对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质量表分进行中心化 (centered), 即减去各自

的总体均数, 再分别以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得分为因变量, 男性特质、女性特质以及性别为预测变量, 进行分层的回归分析。三个一阶的主效应先进入方程, 再进入三个二阶的交互作用项, 最后进入一个三阶的交互作用项。预分析显示, 三维交互作用项在两次检验中都不显著, 并且三维交互作用不和本研究要检验的任何模型相关, 故最后报告不包含三阶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所有结果见表 5。

表 5 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误差源	SWB				PANA			
	B	SE	Beta	t	B	SE	Beta	t
常量	3.888	0.038			4.455	0.030		
S	0.135	0.035	0.104	3.804 *	0.065	0.028	0.063	2.301 *
M	0.280	0.051	0.190	5.474 *	0.271	0.041	0.233	6.662 *
F	0.332	0.057	0.197	5.854 *	0.158	0.045	0.119	3.507 *
M × F	0.039	0.051	0.020	0.757	0.040	0.041	0.027	0.985
M × S	-0.017	0.051	-0.011	-0.335	-0.068	0.040	-0.058	-1.692
F × S	0.011	0.057	0.007	0.200	0.061	0.045	0.046	1.340

注: * $p<0.05$

首先我们检查传统的一致性模型是否获支持。从表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以生活满意度为指标, 还是以积极消极情感为指标, 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都可以显著地预测主观幸福感, 但是, 性别和性别角色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不随性别的变化而变化, 双性化的加法模型获得支持, 高的男性化特质和高的女性化特质不仅意味着高的生活满意度, 还意味着高的情感幸福。为了检验男性化模型的适用性, 我们再对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大小是否存在差异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 二者在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幸福的预测上均没有显著的差异, $F_{(1, 1235)}=0.32, p=0.57; F_{(1, 1235)}=2.28, p=0.13$, 表明男性化特质模型没有得到支持。至此, 我们发现, 无论是考察主观幸福感的认知侧面还是情感侧面, 双性化模型都是理想的模型, 这一点和前面采用

方差分析得到结果是一致的。但是, 回归分析还产生了一些前面的方差分析所没有的发现, 即本研究中适用的是双性化模型中的加法模型而不是乘法模型, 并且传统的一致性模型和当代的男性化特质模型都不适用于中国大学生。同前面的分析一样, 我们依然发现, 在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指标上, 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无论在情感上、还是认知层面上, 都显著地觉得比男生更为幸福, 但前面已经讲过, 这种差异效应本身很小, 不一定具有实际意义。

4 讨论

性别角色是西方当代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性别角色, 西方主要有三种理论: 一致性模型、双性化模型、男性化模型。本研究以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为例对这三种模型在中国文化下的适用性进行了全面的检验,

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我们发现中国大学生,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在女性化量表的得分比在男性化量表上的得分都要高。这一结果和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特征是一致的。集体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对集体性和关系和谐的强调, 因而特别能促进个体集体性特质的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促进女性化特质的的发展。我们还发现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在主观幸福感的情感侧面得分都比认知侧面得分高, 这一点既和中国重“情”甚于“理”的文化传统相一致^[65], 也和跨文化研究中发现的中国人在情感侧面的自我评价高于认知侧面相一致^[66, 67]。

对性别角色的测量, 我们采用的是卢勤等修订的BSRI中文版。总体上, 本研究中所发现的四种类型的分布和苏彦捷等最初的研究中发现的性别角色类型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但是, 当对男女两性样本分别考虑时, 女性样本的性别角色类型和他们的研究一致, 而男性样本却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男性化和双性化两个类别上。我们的研究中, 男性样本的双性化比例高出近个百分点, 男性化比例低近个百分点。考虑到研究中对性别角色的分类是基于以中位数为切分点对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特征进行二分后组合得到的, 男性化和双性化两类的个体在男性化维度上其实都属于高分这一群体, 之所以会和苏彦捷等的研究结果不同, 是因为这些在男性化维度上得高分的群体有更多的在女性化上也得了高分, 从而导致双性化的比例更高, 而单纯的男性化比例比较低。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样本构成的差异, 二是时代变革的影响。从样本角度来看, 本研究采用的是网络样本, 无论从大小还是样本的多样性来看都和他们的研究存在巨大差异。本研究的样本要大得多, 被试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各种不同的大学生, 而卢勤等的研究采用的样本来自西部成都和重庆的三所大学, 西部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可能会导致男性的男性化倾向更普遍一些; 还有可能就是网络样本本身的特殊性, 因为本研究是网民自由参加的, 选择参加我们测验的大学生也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从而导致了本研究的结果。从时代变革的影响来看, 卢勤等的研究发表在2003年, 估计他们的数据采集时间应该更早, 而本研究数据的采集发生在2007年3月到7月之间。近年来, 青少年双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超女”李宇春的双性化形象的走红, 与此相应的双性化文化的流行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69]。

这也可能是导致今天的男性大学生中具有女性特质的个体数量的大量上升, 继而双性化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但是, 所有的这些, 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一种猜测, 真实的原因只能通过未来的研究获得。

本研究在国内并不是第一次试图探讨性别角色和心理健康或适应性的关系。此前, 国内已有不少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性别角色和心理健康或适应性的关系, 大部分的研究都发现双性化是最理想的性别类型^[41~50]。虽然本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但是本研究和以往的研究存在非常重要的不同。此前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基本上都是基于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进行二分的基础上进行的。鉴于这种方法直观的优点, 本研究先是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了类似分析, 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但是, 本研究没有止于此, 而是进一步采用新的基于连续变量的分层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数据的信息, 提高了结果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 基于连续变量的回归分析不仅为双性化模型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 还进一步检验了双性化的乘法模型和加法模型、一致性模型以及男性化模型的适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本研究是第一次在国内采用大样本的网络数据和分层回归分析对所有可能模型同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传统的一致性模型和西方盛行的男性化模型都是不适合当代中国大学生的, 不管性别如何, 男性化的特质和女性化的特质对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是类似的, 双性化模型才是最理想的模型。

双性化模型得到支持, 其实并不难理解。总体上讲, 中国仍属于集体主义文化^[23], 集体性和关系和谐依然非常重要, 女性特质有利于维护和促进这种和谐, 自然最终将促进个体的适应和主观幸福感。同时, 中国当下的多元文化中也包含了许多促进男性化特质的元素, 比如, 主流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西方文化中对自我实现的看重和追求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等等, 这些无不凸显出个体追求幸福过程中男性化特质的重要性, 本研究发现的男性化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应该是对这些文化元素作用的反映。总之, 中国当下多元的文化中既有促进个体男性化特质的因素、也有促进个体女性化特质的因素, 再加上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 在这样的文化现状下, 同时具有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的双性化成为理想性别角色类型, 自然成为适应当下文化的必然结果。以往的许多研究也都发现了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是, 本研究还进一

步发现,得到支持的是双性化的加法而不是乘法模型,表明男性化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随女性化特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反之,女性化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也不随男性化特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传统的一致性模型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男性特征并不更有利于促进男性的幸福感,女性特征也不更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幸福感,两类性别角色特征对两性来说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男女有别的观念在当代大学生中已经很少有影响了,无论如何,这都是时代的进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西方得到大量实证研究支持的男性化模型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这表明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在引言中已经谈过,性别角色、主观幸福感和文化关系密切。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盛行,主观幸福感更多地与个人的自我实现和情感满足相联,相对于以集体性和表达性为主的女性化特质,以独立性、能动性为主的男性化特质对心理健康更为重要应该是很自然的;而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主观幸福感更多地和个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集体目标的实现相联,不利于关系和谐和集体成功的男性化特质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不如西方突出,应该也是很容易理解的^[26-32]。

这些发现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在文章一开始就谈过,文化是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变量,迄今的大量研究已经发现文化差异可以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心理过程和行为之中。我们的研究第一次发现这种差异也存在于性别角色模式中,在当代西方被认为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式——男性化模式并不适合于属于东方文化的中国。这表明,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型具有文化特异性,不同的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式,而同一种性别角色类型在不同的文化下也有着不同的适应价值。在当代西方,男性化的个体将具有最好的社会适应和幸福感受,而在当代中国,最好的适应和幸福不仅和高的男性化水平相联还和高的女性化水平相联。这一点将对在中国文化下培养人们良好的个性品质,增进人们心理健康的实践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在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中,既要着力培养以个体独立、能动性和自信为核心的男性化特质,又要着力培养以理解、善良、合作为核心的女性化特质,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体在日常的生活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适应

能力^[70],从而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本研究的结果来自网络数据,也许有人会质疑数据的可靠性。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怀疑在本研究中是没有必要的。第一,虽然国内很少有利用网络数据开展的研究发表,但是,在国外已经很常见^[57]。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大量研究也表明,网络数据是可靠的,基于网络数据得到的结果是可信的^[57,58]。第二,为了最大限度避免极端数据对结果的影响,在进行正式的数据分析之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严格的清理(clean),最大限度地保证在进一步分析中数据的可靠性。第三,在进行数据清理后,本研究所用的四个分量表各自的内在一致性系数非常高,表明被试在各项目的回答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不是随意或随机回答的。第四,数据得出的许多基本结果也表明我们的数据是可靠的。首先,本研究的许多结果和国内其他类似研究是一致的,比如,主观幸福感两个分量表的均数和标准差都和其他研究结果类似^[57,70],性别差异状况也类似^[72]。其次,数据反映了许多预期的差异。根据理论和以前的研究,我们预期中国大学生在女性化量表上得分将高于男性化量表上的得分,在主观幸福感的情感侧面得分高于认知侧面的得分,结果都证实了我们的设想。还有,我们得到的最终结果,即双性化模型而不是男性化模型适于中国也很好地反映了我们的文化现实,和以前的大部分研究的结果也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一致地表明,我们的网络测验不仅是可信的,而且还反映了预期的差异,是有效的,因而基于这些数据的结果也是可靠的。

最后,我们想指出的是,本研究只检验了性别角色模型在揭示中国文化下性别角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适用性。研究表明,运用不同的指标时,适用的模型有可能不同^[73]。对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其他指标,三种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还有待未来更多研究的检验。还有,本研究还只检验了大学生样本,对于中学生和其他年龄阶段的个体,情况如何,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Masuda T, Nisbett R E. Attending holistically versus analytically: Comparing the context sensitivity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 922-934
- 2 Ji L, Zhang Z, Nisbett R E. Is it culture or is it language? Examination of language effec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categor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 87; 57 ~65
- 3 Peng K, Nisbett R E.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9, 54: 741 ~754
- 4 Menon T, Morris M W, Chiu C, Hong Y. Culture and the construal of agency: Attribution to individual versus group disposi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6: 701 ~717
- 5 Heine S J, Lehman D R, Markus H R, Kitayama S. Is there a universal need for positive self-regard?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 766 ~794
- 6 Lee A Y, Aaker J L, Gardner W L. The pleasure and pains of distinct self-construals: The role of interdependence in regulatory foc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 1122 ~1134
- 7 Ji L, Nisbett R E, Su Y. Culture, change, and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12: 450 ~456
- 8 Iyengar S S, Lepper M R. Rethinking the value of choice: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6: 349 ~366
- 9 Cohen D, Gunz A. As seen by the other: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in the memories and emotional perceptions of Easterners and Western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2, 13: 55 ~59
- 10 Oishi S, Wyer R S, Colcombe S J.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current life satisfaction to predict the fu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 434 ~445
- 11 Suh E M, Diener E, Oishi S, Triandis H C. The shifting basis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cultures: Emotions versus nor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 482 ~493
- 12 Fiske A P, Kitayama S, Markus H R & Nisbett R E. 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Lindzey G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868 ~981
- 13 Lehman D, Chiu C, Schaller M. Culture and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4, 55: 689 ~714
- 14 Bern S L.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74, 42: 155 ~162
- 15 Bern S L. Probing the promise of androgyny. In: A G Kaplan, J P Bean (Eds.). *Beyond sex-role stereotypes: Readings toward a psychology of androgyn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 16 Cook E P.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Pergamon Press Inc, 1985. 70 ~125
- 17 Whitley B E. Sex role orientation and self-esteem: A critical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4: 765 ~778
- 18 Whitley B E. Sex role orien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wo meta-analyses. *Sex Roles*, 1984, 12: 207 ~225
- 19 Lubinski D, Tellegen A, Butcher J N. Masculinity, femininity and androgyny viewed and assessed as distinct concep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4: 428 ~439
- 20 Taylor M C, Hall J A.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theories,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2, 92: 347 ~366
- 21 Bassoff E S, Glass G V. The relation between sex roles and mental health: A meta-analysis of twenty-six studies.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982, 10: 105 ~110
- 22 Dimitrovsky L, Singer J, Yinon Y. Masculine and feminine traits: Their relation to suitedness for and success in training for traditionally masculine and feminine army fun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7: 839 ~847
- 23 Mischel W. Sex-typing and socialization. In: P E Mussen (Ed.). *Carmi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2. Wiley, New York, 1970
- 24 Oyserman D, Coon H M, Kemmelmeier M.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2, 128: 3 ~72
- 25 Markus H,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 224 ~253
- 26 Diener E, Diener M. Cross-cultura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 653 ~663
- 27 Kwan V S Y, Bond M H, Singelis T M. Pancultural explanations for life satisfaction: Adding relationship harmony to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 1038 ~1051
- 28 Oishi S, Diener E. Goals,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1, 27: 1674 ~1682
- 29 Oishi S, Wyer R S Jr, Colcombe S J.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current life satisfaction to predict the fu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 434 ~445
- 30 Schimmack U, Radhakrishnan P, Oishi S, Dzokoto V. Culture,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grating process models of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 582 ~593
- 31 Suh E M. Culture, identity consiste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1378 ~1391
- 32 Suh E M, Diener E, Oishi S, Triandis H C. The shifting basis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cultures: Emotions versus nor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 482 ~493
- 33 Elegant S. China's me generation. *Times*, 2007, July 26
- 34 Shi Y L. Review on sex role types and related factors in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Shandong Science & Engineer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2005, 21 (5): 97 ~100 (石艳玲. 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及相关因素研究综述.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1 (5): 97 ~100)
- 35 Song L L. Review on androgyny research i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Northeast Financial University*, 2006, (3): 87 ~88 (宋丽丽. 大学生性别角色双性化研究综述.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6, (3): 87 ~88)
- 36 Qian M Y, Zhang G J, Luo S H, Zhang X. Sex Role Inventory for college students (CSRI)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0, 32 (1): 99 ~104

- (钱铭怡, 张光健, 罗珊红, 张莘.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的编制. 心理学报, 2000, 32 (1): 99 ~104)
- 37 Lu Q, Su Y J. Revision of Bem Sex Role Inventory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003, 17 (8): 550 ~553
(卢勤, 苏彦捷. 对 Bem 性别角色量表的考察与修订.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 (8): 550 ~553)
 - 38 Cui H, Wang D F. Construction of Sex Role Adjective Scale for Chinese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al Science, 2005, 14 (10): 948 ~951
(崔红, 王登峰. 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的建构.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 14 (10): 948 ~951)
 - 39 Cai H J, Yang Z L. Using IAT to study the structure of gender self-concept (in Chines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2, 34 (2): 168 ~174
(蔡华俭, 杨治良. 大学生性别自我概念的结构. 心理学报, 2002, 34 (2): 168 ~174)
 - 40 Ren B X, Zhang X F. Distribu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gender traits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06, 27 (2): 147 ~148
(任伯绪, 张晓方. 大学生性别特质分布特点研究. 中国学校卫生, 2006, 27 (2): 147 ~148)
 - 41 Yang L, Wang X X.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sex role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of Sciences, 2005, 05: 23 ~28
(杨玲, 王雄雄. 大学生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 高等理科教育, 2005, 05: 23 ~28)
 - 42 Lu S D, Yuan L 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role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nese).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02, 10 (6): 470 ~471
(卢声达, 袁立新. 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 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2, 10 (6): 470 ~471)
 - 43 Cui H, Wang D F.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stereotypes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for Chinese subjects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13 (4): 411 ~413
(崔红, 王登峰. 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 (4): 411 ~413)
 - 44 Du J. The influence of androgyny to university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Science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7, Z1: 131 ~135
(杜军. 双性化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心理科学, 2007, Z1: 131 ~135)
 - 45 Wang Z H, Zhang J X. Impacts of sex, sex role and gender belief on undergraduates' personality traits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007, 23 (3): 50 ~55
(王中会, 张建新. 性别、性别角色和性别观念对大学生人格特征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 23 (3): 50 ~55)
 - 46 Zhai X J. Correlation between sex role types and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ve, 2006, 10 (30): 45 ~47
(翟秀军. 大学生性别特质类型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 中国临床康复, 2006, 10 (30): 45 ~47)
 - 47 Li S M.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rogyny and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1998, 27 (4): 148 ~152
(李少梅. 大学生双性化性别特质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27 (4): 148 ~152)
 - 48 Liu Y M. Androgyn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Ningbo Radio & TV University, 2006, 4 (1): 64 ~66
(刘玉梅. 大学生的双性化人格与人际交往.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4 (1): 64 ~66)
 - 49 Wang H R.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rogyny and emotional stat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Shandong Youth Administrative Cadres' College, 2005, 01: 49 ~50
(王红瑞. 大学生双性化人格特质与情绪状态的相关研究.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01: 49 ~50)
 - 50 Yu X F, Deng X N, Wang L H.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rol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04, 25 (1): 39 ~40
(余小芳, 邓小农, 王立皓. 性别角色与焦虑及抑郁的相关研究. 中国学校卫生, 2004, 25 (1): 39 ~40)
 - 51 Xu Y, Ji L Q, Zhang W X. Urban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parent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gender roles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006, 03: 35 ~40
(许岩, 纪林芹, 张文新. 城市父亲参与儿童教养的特点及其与性别角色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03: 35 ~40)
 - 52 Li S G, Zheng Y. A research on effects of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on children's dual-gender rol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2006, 8 (3): 99 ~102
(李曙光, 郑艳.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性别双性化发展影响的研究.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6, 8 (3): 99 ~102)
 - 53 Cohen J. The cost of dichotomiz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83, 7: 249 ~253
 - 54 Aiken L S, West S G.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1
 - 55 McClelland G H, Judd C M. Statistical difficulties of detecting interactions and moderator effec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3, 114: 376 ~390
 - 56 Stone-Romero E F, Anderson L E. Relative power of 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the comparison of subgroup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detecting moderating effec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4, 79: 354 ~459
 - 57 Gosling S D, Vazire S, Srivastava S, Oliver J. Should we trust web-based stud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x preconceptions about internet questionnair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4, 59 (2): 93 ~104
 - 58 Cai H J, Lin Y J, Wu Q P, et al. Examining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between paper-and-pencil and internet-administered test: Take life-satisfaction scale for example (in Chines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8, 40 (2): 228 ~239
(蔡华俭, 林永佳, 伍秋萍, 严乐, 黄玄凤. 网络测验和纸笔测验

- 的测量不变性研究: 以生活满意度量表为例. 心理学报, 2008, 40 (2): 228 ~239)
- 59 Nosek B A, Banaji M, Greenwald A G. Harvesting implicit group attitudes and beliefs from a demonstration web site. *Group Dynamics*, 2002, 6: 101 ~115
- 60 Srivastava S, John O P, Gosling S D.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in early and middle adulthood: Set like plaster or persistent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 (5): 1041 ~1053
- 61 Robins R W, Trzaskowski K H, Tracy J L, Gosling S D, Potter J. Global self-esteem across the lifespan.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2, 17: 423 ~434
- 62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 71 ~75
- 63 Pavot W, Diener E. 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3, 5: 164 ~172
- 64 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Hillsdale, NJ: Lawrence Earlbaum Associates, 1988
- 65 He Y H, Peng S Q, Zhao Z Y.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y (i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6 ~158
(何友晖, 彭泗清, 赵志裕. 世道人心: 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46 ~158)
- 66 Cai H, Brown J D, Deng C, Oakes M. Self-esteem and cultur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self-evaluations or affective self-regard? *Journal of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2007, 10: 162 ~170
- 67 Tafarodi R W, Swann W B. Self-liking and self-competence as dimensions of global self-esteem: Initial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95, 65: 322 ~342
- 68 West S G, Aiken L A, Knull J L. Experimental personality designs: Analyzing categorical by continuous variable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6, 64: 1 ~68
- 69 Hu Y, Tang R X, Zhang L F.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androgyny in last ten years: Idea from Li Yuchun's neutral beauty (in Chinese). *Entrepreneur World: Theory Division*, 2006, 04: 153 ~154
(胡燕, 唐日新, 张丽芳. 近十年来的双性化人格研究综述——由李宇春中性之美想到的. 企业家天地: 理论版, 2006, 04: 153 ~154)
- 70 Cheng C. Processes underlying gender-role flexibility: Do androgynous individuals know more or know how to co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5, 73: 645 ~674
- 71 Xu W D, Wu M Z, Qiu F D.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 28 (3): 562 ~565
(徐维东, 吴明证, 邱扶东. 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心理科学, 2005, 28 (3): 562 ~565)
- 72 Wang F, Chen F 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Medical Science*, 2005, 14 (6): 575 ~576
(王芳, 陈福国.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 14 (6): 575 ~576)
- 73 Marsh H W, Byrne B M. Differentiated additive androgyny model: Relations between masculinity, femininity,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of self-concep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1: 811 ~82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ro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CAI Hua-jian¹, HUANG Xuan-feng¹, SONG Hai-rong²

(¹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California, 95616, USA)

Abstrac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m Sex Role Inventory (BSRI) in 1974, numerous studies have been devoted to sex role. Among these studies, the relation of sex-role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has received the most attention. To date, three theories regarding the utility of sex-roles have been proposed: the congruency model, the androgyny model, and the masculinity model. The congruency model posits that masculinity facilitates males' mental health but not females' while femininity facilitates females' well-being but not males'. Androgyny model states that people with high levels of both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enjoy the highest level of well-being independent of their gender. Masculinity model holds that masculinity is the dominant factor that promotes on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ince most related studies have been done i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test the generality of the findings in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 China,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 of sex-role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Sex-role was measured by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SRI (for masculine subscale, $\alpha = 0.86$; for feminine subscale, $\alpha = 0.82$);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measured by scale developed by Diener and his colleagues (1985) (for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alpha = 0.85$; for the Positive Affections and Negative Affections Scale (PANAS), $\alpha =$

0.85). Both scales were rated on a 7 – point likert scale. A total of 1242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above mentioned two scales online among which 394 were male and 848 were female. The age of the sample ranged from 17 to 25 with a mean of 20.88 (SD =1.46).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cored higher on feminine scale than on masculine scale, confirming the collectiv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Two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with sex,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as predictors and SWL and PANAS as criteria, respectively.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sex,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were significant, but none of the interactions were significant. This suggests that the additive androgyny model is most appropriate i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 of sex – role to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Chinese culture. Currently, the traditional congruency model is not applicable to neither Western nor Eastern cultures. However, a masculine sex role is ideal in western world while androgyny is ideal in China, suggesting differences exist across cultures in ideal sex – role type. The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findings of sex role related research based on a western sample should not be assumed to generalize to other cultures without further examination.

Key words sex role, masculine, feminine, androgyny, China.